

《青年近卫军》是怎样炼成的？

刘亚丁



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的作者是法捷耶夫（1901年—1956年）。他16岁加入布尔什维克，次年成为游击队战士，很快成长为旅政委。他的第一部小说《毁灭》经鲁迅由日文翻译成中文，于1931年出版。法捷耶夫曾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率团瞻礼新中国开国大典。在他的作品中，《青年近卫军》堪称代表作。

历史视角：正义战胜邪恶

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以“青年近卫军”的史实为基础，表现人们在矿区小城克拉斯诺顿的地下斗争，颂扬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揭示法西斯的反人类本性。小说中，克拉斯诺顿党的领导普罗茨科既领导游击队，又指导青年近卫军。青年近卫军战士主要是中学生，他们与侵略者展开机智无畏的斗争，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青年近卫军的年轻成员，在斗争中都义无反顾，勇于牺牲。青年近卫军的领导者奥列格牺牲前说：“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再不能与我的人民一起，与全人类一起，为正义的、诚实的生活制度而战了。”

《青年近卫军》的叙事者既揭示了侵略者的凶残，也描述了他们的贪婪。德国党卫军军官芬庞有一条“腰带”，里面装满了他从死人口里拔下的金牙；俄国的富农福明原来占有两个庄园、一个果园、一个养蜂场、两个面粉厂，德国人入侵克拉斯诺顿后，他出卖近卫军战士，主动投奔侵略者，充当伪警察；斯塔茨柯一向崇拜媚外，厌恶苏维埃社会，德军一来，他立刻主动投靠，被封为伪市长。本国的剥削者、堕落者与代表资本主义世界的德国法西斯苟合于一隅，组成了残害人民的黑色联盟。对敢于反抗侵略的苏联人民，包括党的领导和年纪轻轻的青年近卫军战士，他们残酷迫害，无情杀戮。小说结局处，被法西斯抓捕的57位青年近卫军战士慷慨就义，舒尔迦、刘季科夫、巴腊科夫等布尔什维克也被法西斯残酷杀害。

小说以克拉斯诺顿解放为结尾，人们沉浸在悼念该城牺牲者的悲痛中。在小说的第五章胜利的原因：“斯大林格勒，——这是新的苏维埃制度所产生的人们的组织天才的最好证明”；“斯大林格勒，——这是摆脱了资本主义的锁链的人民的战斗力量和历史智慧的表现。”这也是法捷耶夫力图揭示出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深层原因。

美学视角：崇高弥漫天地

古罗马时代的美学家朗吉弩斯指出：崇高的话语产生于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在《青年近卫军》中，遭受敌寇铁蹄践踏的祖国形象就是这思想与情感的推进器。例如赶马车的老太爷，“回想起俄罗斯的伟大富饶，近10年它变得更加富饶了，他就想，难道德国人真有力征服俄罗斯吗？”在年轻人阿那托里的心里，“时刻怀着这种对祖国的感情，当他听到心爱的歌声或是看到被践踏的庄稼和被焚烧的农舍时，这感情就使他热泪盈眶。现在他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这样深重的灾难，使人无论看到或者想到都不能不为之心如刀割。”这就激起阿那托里和他的同龄人奋起抗击侵略者的意志和决心。

《青年近卫军》中的中学生们，

“打卡”欧洲各国名画，更为人们呈现了一场西班牙本国艺术盛宴：从16世纪的格列柯，到17世纪的委拉斯开兹，再到19世纪的戈雅，都是开山立派、成就卓越的大家，西班牙艺术史的确星河灿烂。

画家多梅尼科·塞奥托科洛洛，人称埃利·格列柯，即“来自希腊的人”，他少时经意大利来到西班牙并度过一生。他的画作融合了多种艺术源泉，如来自希腊的拜占庭圣像画风格、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风格主义。这些艺术风格在画家手中融会成独一无二的艺术样式——浓烈的色彩，似乎处于凝固临界点的颤动笔触，弱化体积感的轻盈人物如梦境般飘浮在观者眼中，好似凝聚的流沙。

委拉斯开兹是西班牙国宝级艺术家，一生为西班牙王室服务，创作了大量王室成员肖像和以西班牙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大型画作。其中描绘包括菲利普四世国王夫妇及公主肖像在内的西班牙宫廷内廷人物的《宫娥》，是普拉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复杂缜密的布局及人物刻画至今仍是艺术界研究探讨的对象。委拉斯开兹的笔触流畅生动，色彩温和饱满，构图充满巧思。作为一位终生服务于宫廷的画家，其艺术活力却不仅仅止步于描绘高贵的人物和华丽的绫罗，他的画笔同样描绘出黎民的温度。如普拉多博物馆所藏的《纺织女工——阿刺克涅的寓言》，将底层的纺织女工作为宏大画面的主角，画家赋予其古代神话的隐喻之意，将这些赤脚纺织的女性嵌入史诗语境。当观者的目光透过她们昏暗逼仄的工作坊向远处延伸，看到的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贵妇华服和豪华昂贵的织毯，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委拉斯开兹既身佩骑士勋章服务御前，又目光独具看尽人间风霜，堪称西班牙国宝，也是西方艺术史上最瞩目的艺术家之一。

19世纪，西班牙又诞生了一位兼具浪漫与现实情怀的艺术家——戈雅。他是拥有生动夺目笔法和色彩的大师，亦是洞察社会的历史记录者——立于他画面之中的不仅有国王一家（《查理四世一家》），还有在小山之上被枪杀的西班牙起义者（《1808年5月3日枪杀起义者》）。

作为国家美术馆，普拉多拥有最丰富的西班牙艺术收藏，除却大师，还有许多人们以前并不了解、观后深受触动的“惊喜”。如西班牙中世纪罗曼风格的壁画，一丝不苟的线条与图案充满装饰感。如19世纪画家安东尼·穆尼奥斯·德格兰的《特鲁埃尔的恋人》，以扎实的古典技法还原了这个悲伤的中世纪爱情故事，在3米乘5米的宏大尺幅中，精致的人物、器具，纵深的空间，使画面呈现如戏剧中的一幕，令人心潮澎湃。还有华金·索罗利亚—巴斯蒂达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然而他们仍然抱怨鱼太贵！》，几乎以新闻照片的方式描绘了渔夫的艰难营生：杂乱破旧的船舱里堆着捕捞上来的鱼，还有为之付出生命的少年和他衣衫褴褛的同伴。不稳定的构图，零乱的杂物与人物衣衫、皱纹的细致刻画，以及逼仄观众视线的大透视都令画作无比真实而沉重。

可以说，构成普拉多博物馆丰富馆藏的一半是欧洲的精华，一半是民族的精彩。这座西班牙国家美术馆不只是一座不容错过的旅游地标，更是民族艺术的展示窗口，令世界各地的游客看到西班牙艺术的光芒。它也让我看到了博物馆对于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馆藏陈列可以直观地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感悟一个国家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灿烂的艺术魅力。

诚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中求索，要全方位感知、了解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前世今生”，这才是滋养文学翻译的肥沃土壤。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或不常与中国保持联系的西班牙语国家译者，很难翻译好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国译者如果没有与西班牙语国家的交往经历并持续关注当地情况，也难以做好近现代西班牙语文学的翻译工作。

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培养西班牙语教师和译者，近年来，西班牙语在中国愈发受到重视和欢迎。虽起步较晚，但西班牙语国家对中文、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重视一年更胜一年。如今，拉美国家与中国在政治、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前景越来越光明，这是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的机遇，为译者了解对方国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作为“文化使者”，译者也将作出更大贡献。

巴勃罗·罗维塔，1958年生于乌拉圭，1975年到访中国，曾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清华大学，就职于西班牙埃菲通讯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商务处等机构。他参与翻译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9—1949》《拣珍珠——短篇小说佳作》等作品，著有《70年代在中国》一书。

普拉多博物馆印象

褚纪亭



图①：委拉斯开兹作品《纺织女工——阿刺克涅的寓言》(1655年—1660年)。
图②：戈雅作品《吹气囊的孩子们》(1777年—1778年)。
图③：普拉多博物馆外景。
资料图片



巴勃罗·罗维塔

相比，西班牙语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也较晚，中国文学作品进入西班牙语国家的情况亦如此。

这塑造了读者的阅读习惯：西班牙语读者更容易理解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近现代文学作品。同样，大部分中国读者对于英国、美国、法国及俄罗斯等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化背景较西班牙语国家更为熟悉。这样一来，中国文学作品与西班牙语文学作品的互译及传播，对两国翻译家和读者而言，难度都更大一些。

此外，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汉语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烙印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时，西班牙语国家较多，虽然语言相通，但各国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现状。西班牙语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因而更为复杂明显，如若翻译不当，容易造

普拉多博物馆是西班牙的国家美术馆，也是著名的西方美术作品收藏地之一，素有“小卢浮”之称。这座新古典风格的建筑始建于18世纪末，起初准备用作自然科学博物馆，但因18世纪末的一系列政治动荡而迟迟未能建成。后来，国王费迪南七世将其辟为“皇家绘画及雕塑博物馆”，很快更名为“国家绘画及雕塑博物馆”，最后定名为“普拉多国家博物馆”，于1819年起面向公众开放。“普拉多”(Prado)一词直译为草地，是建筑所在地的名称——现在博物馆前的大道依然名为“普拉多大道”，热闹繁华，是人文荟萃之地。

在两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普拉多博物馆数次扩建，藏品也不断丰富，方有今天的规模：占地4万平方米，拥有数以千计的绘画、雕塑名作，上万件素描、版画及工艺品收藏。它们最初主要来自西班牙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的王室收藏，后来通过私人捐赠和国家收购的途径不断充实。

汇集欧洲艺术精华

作为欧洲艺术作品最重要的藏馆之一，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着众多欧洲历代名家作品，自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巴洛克直至19世纪。大量作品都是西方艺术史上的瑰宝，它们也是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主要缘由。

普拉多藏有43件提香真迹，数量颇为可观。人们可以循着时间轨迹感受这位文艺复兴大师超长艺术生涯中的坚持与变化——浓烈的色彩，越来越奔放跳跃的笔法——这样粗犷的笔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绘画中是十分前卫的。其中有提香非常著名的肖像作品《费德里科二世冈萨加》，这位第一任曼托瓦公爵身着一袭丝绒蓝衣，鲜亮夺目，人物在画家生动的笔触中栩栩如生。此外，馆内所藏的多幅提香古典神话题材作品充分展现了大师在呈现肌肤质感方面的绝妙。

在普拉多，不仅能欣赏到如提香、拉斐尔、丢勒、鲁本斯、伦勃朗等耳熟能详的大师作品，尤其珍贵的还是还能看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北部佛兰德斯（今天法国最北端、比利时及荷兰一带）的名作——由于西班牙王室对这一地区曾经的统治，博物馆保有不少该地区的珍品。

希罗涅缪斯·博斯的画在文艺复兴时期特立独行。他的几件重要作品都可在普拉多博物馆得见真容，如著名的《尘世乐园》——描绘了天堂、人间与地狱的景象。丰富繁杂的画面，光怪陆离的异想世界，博斯的绘画让一代又一代后世学者猜度琢磨，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充满奇想的生物和行为，都抽离了端庄典雅与写实自然的文艺复兴主流风格，令人品味出不同的味道。

活跃于16世纪的老彼得·勃鲁盖尔可谓是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最“接地气”的大师，他把风俗画画出了史诗巨作的高度。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领略佛兰德斯地区生动的风俗生活细节，其中更蕴含着富有巧思的隐喻哲理。普拉多博物馆收藏有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一件大尺幅画作《死神的胜利》，如对画家影响巨大的前辈博斯的作品一样，如此内容繁复的画作非近观不能体味其魅力。细细端详，好似卷入一个漫长的电影镜头：无声，有色，真切。

呈现西班牙艺术盛宴

普拉多博物馆不仅让游客能够集中

翻译家说

好翻译要上“社会大学”

我与中文“打交道”已快50年。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为中国外文出版社将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其中包括郭沫若、冰心、巴金、陆文夫等人。因工作需要及个人兴趣，我经常阅读中国的报纸杂志，用汉语与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我的“业余翻译”范围较广，除做口译外，也翻译不同类型的文章、报告，涉及文学文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不同领域。这令我对于西班牙语与汉语间的翻译积累了经验，油然而生了一些思考。

文学翻译为推动、巩固不同民族间的联系和了解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重要性在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之间具有普遍性，在西班牙语国家与中国之间则更为突出：从地理角度来讲，拉丁美洲作为主要西班牙语国家分布地，与中国相距遥远。在历史上，西班牙语国家与中国的交流往来相对较少。与其他语系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雷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rbgf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